

战略文化简明读本

李明 著

地 质 出 版 社

战略文化简明读本

李明 著

地质出版社

· 北 京 ·

内 容 提 要

本书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中国战略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战略文化的性质、影响因素及特征，中西战略文化的对比，战略文化的社会功能。

本书可供战略文化爱好者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战略文化简明读本 / 李明著.
—北京：地质出版社，2010.9
ISBN 978-7-116-06872-8

I. ①战… II. ①李… III. ①文化—中国—通俗读物
IV. ①G1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74151 号

ZHANLUE WENHUA JIANMING DUBEN

责任编辑：刘亚军 龚法忠

责任校对：杜 悦

出版发行：地质出版社

社址邮编：北京海淀区学院路 31 号，100083

咨询电话：(010)82324508 (邮购部)；(010)82324578 (编辑室)

网 址：<http://www.gph.com.cn>

电子邮箱：zbs@gph.com.cn

传 真：(010)82310759

印 刷：北京长宁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9mm × 1194mm $\frac{1}{32}$

印 张：5.625

字 数：150 千字

版 次：2010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 第 1 次印刷

定 价：20.00 元

书 号：ISBN 978-7-116-06872-8

(如对本书有建议或意见，敬请致电本社；如本书有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引言 战略文化——战略研究的新视角	1
第一章 中国战略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3
第一节 中国古代战略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3
一、先秦时期	3
二、秦汉至隋唐五代时期	15
三、宋至清前期 (1840 年前)	33
第二节 中国近代战略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47
一、近代战争观念与国防思想	47
二、近代建军治军思想	50
三、近代战略思想	53
第三节 中国当代战略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56
一、《孙子兵法》对当今中国战略文化的深厚影响	56
二、毛泽东军事思想在当代中国战略文化中的地位	62
第二章 战略文化的性质、影响因素及特征	73
第一节 战略文化的性质	73
一、战略文化的政治性	73
二、战略文化的对抗性	75
三、战略文化的超前性	76
四、战略文化的创新性	77
五、战略文化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	77
六、战略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	78
第二节 影响战略文化的因素	78
一、文明的不同特性	78

二、地缘环境	80
三、文明的历史经验	81
四、文化价值观念	82
第三节 中国战略文化的特征	83
一、求和平	83
二、谋统一	85
三、重防御	105
第四节 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缺陷	110
一、国防意识的缺失	110
二、缺乏积极长远的战略方针	112
三、缺乏主动进攻精神	114
四、重道轻器思想致装备落后	117
第三章 中西战略文化的对比	120
第一节 西方战略思想发展概述	120
一、西方古代军事战略思想	120
二、西方近代军事战略思想	122
三、现代军事思想	124
第二节 中西战略思想文化之比较	126
一、中国十分强调防御的地位，而西方则注重进攻	126
二、中国战略文化重视安定内部，西方战略文化 着眼对付外邦	129
三、中国重视战争道德，西方国家无视战争道德	131
四、中国提倡“不战而屈人之兵”，注重“文治”； 西方国家把靠武力维护统治作为用兵的最终目的， 倡导尚武精神	134
五、中国在战争指导上，强调以计为首、谋略制敌， 奉行智慧加力量的理念；西方国家主张强兵为 要、勇敢制敌，奉行力量加技术的理念	137

六、历史上中国军事家长于理论思维，西方军事家长于就事论事·····	141
第三节 西方传统战略文化在当代·····	143
一、力量加技术的理念·····	143
二、寻找目标·····	144
三、用改革创新推动社会发展·····	145
四、海洋在西方战略思想中的重要地位·····	145
第四章 战略文化的社会功能·····	147
第一节 当今社会中先进文化的基本内容与特征·····	147
一、先进文化的界定·····	147
二、先进文化的内容与特征·····	148
三、先进文化的判断标准·····	149
第二节 战略文化在当代先进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	150
第三节 战略文化与综合国力、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关系·····	153
一、综合国力概述·····	154
二、国家文化软实力·····	157
三、战略文化与综合国力及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关系·····	160
第四节 普及战略文化知识，提高国民综合素质·····	165
一、普及战略文化知识的意义·····	166
二、普及战略文化的目的·····	167
三、普及战略文化的方式·····	167
后记·····	169
参考文献·····	171

引言 战略文化——战略研究的新视角

一个新概念在社会科学领域的提出，往往代表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领域的诞生。战略文化研究即是如此。它最早出现于美国 1947 年制定的“领导条令”中。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才被部分美国学者认定为一个正式的学术概念而受到广泛关注。此项研究方面的著名代表人物有江忆恩、约瑟夫·奈、安德鲁·内森等。战略文化研究在中国起步较晚，约出现于 20 世纪 80 年代。而正式使用这个概念，是在 1997 年《中国军事科学》第 1 期中的《论战略文化》一文中。2001 年版的《战略学》对战略文化的定义是：它是一个国家在战略行为上所表现出来的持久性的、相对稳定性的文化特征；是一个民族与文明的历史经验、民族特性、价值追求以及文化心理在战略领域的集中反映。

世界上每一种文化传统都包含着关于战争的思想。每一种战略思想，又都与一定的思想文化相联系。思想文化以人对自然、人对人的态度、人的生存方式及其生命意义为主要内容。战略文化服从、服务于当时的国家政治，但它又深刻地反映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文化和哲学传统。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战略文化，都有着其固有的传统文化的烙印，也就是说，战略的根基是思想文化，而且战略思想最终要汇入到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思想文化的发展历史中去。从这个方面讲，战略思想也是一种文化，它的发展是一种文化现象，换言之，思想文化与战略相结合即为战略文化。战略文化是制定现实战略的潜在意识和历史文化情结，因为战略家只能在特定的历史文化环境中进行认识和实践创造活动。所以说，

从战略文化角度去分析国家战争准备与实施，去探究深层次的思想文化和哲学背景，并将战略文化进行社会普及，是当代文化工作者的重要任务和社会责任。

第一章 中国战略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第一节 中国古代战略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一、先秦时期

约公元前 2070 年，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王国——夏王朝建立。从此，直到秦始皇横扫六国，统一天下，建立起统一的封建专制——中央集权——国家，期间经历了夏、商、周、春秋、战国等多个重要历史阶段（通常称为先秦时期，在西周时期有了“中国”一词）。这个时期，是中国奴隶社会产生、发展、繁荣并最终灭亡的时期，也是中国封建社会萌芽和初步确立的时期。在此期间，社会生产力逐步发展，由木石器、铜器并用向青铜铁器文明过渡，完成了三次社会大分工；王权专制倾向日益加强，文武分职初步形成；思想文化走向繁荣，史官文化代替巫祝文化；学术下移，取代学在官府，诸子学派形成，百家争鸣兴起。随着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和完善，战略文化的各要素已经日趋成熟。具体表现为以下一些重要特征。

（一）军事活动走向正规

夏代的军队，是以领土财产为基础的国家军队和以血族团体为基础的氏族武装并存。商周时期，出现了常备军，形成了步、车、骑和舟师水军等兵种。西周出现了“师”的最大编制，是西周的正规军队。同时，以兵农合一的原则为主体，建立等级兵役制度，修建城池等防御工事。

战争种类齐全。有商汤伐桀、武王伐纣为代表的王朝更替战

争，周公东征的战争，中原诸侯与周边少数部落的战争，诸国争霸与大国兼并战争，下层民众反抗暴政的武装斗争等。这一时期的战争，大多是堂堂的正面会战，其特点是最初为正面的大规模的密集方阵进攻；继之以车兵为主、步兵为辅的疏散方阵进攻。长期的战争实践，陆续出现了城池攻守战、奇袭战、火攻、水淹、地道战等战法。

（二）军事制度日趋完备

军事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受两个方面的影响和制约。首先，它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受制于政治制度的发展，与历代政治制度的发展变化同步进行。其次，是根据战争发展的需要而不断发展。因为军事技术的进步，必然带来作战方式的改变，并导致军队组织等各方面的变化。正如恩格斯所说：“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军事的目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它们便立刻几乎强制地，而且往往违反指挥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的改变甚至变革。”夏王朝实行兵民合一军制，平时从事生产，战时应征从军，军事编制最大为“旅”级单位。商代军队有王室军和国家两大体系，主要兵种为步兵，以步战为主。西周实行分封制，周天子是军队的最高统帅，他不仅握有强大的王室军，而且对诸侯军队有组建权和指挥权，建立了全国最高军事管理机构——司马。它掌管全国的军赋，组织服役人员进行训练和演习，负责执行军事纪律。它的设立，是西周奴隶制军事制度完备的重要标志。春秋战国时期，军事制度虽有发展，但由于受生产力发展的限制，政治、军事制度变革发展较慢。

（三）武器装备的大力发展

夏商周时期，主要兵器有戈、矛、刀、戚等，以青铜器为主，同时驯养马匹，提高军队的运输能力，提高军队的机动性。在商代，“城池”成为重要的国防设施。商王和各诸侯的重要政治经济中心几乎都筑有城池。西周时期，除传统兵器外，出现了戟和剑等新兵器。春秋战国时期，冶铁技术的出现，使兵器装备的质量大为提高，而且种类增多，优于以前的青铜兵器；这些兵器分别

用于步战、车战、骑战和城防，使作战方法和作战样式更加丰富。

（四）军事思想体系的确立

萌芽阶段：夏商时期，受社会发展阶段的限制，军事制度具有兵农合一特点，初步形成了以王室为中心的上下统一的军事指挥系统，所以军事活动体现出一定意义上的军事谋略思想和兵法。如重视战前准备，实施宣传战、攻心战，出现了伏击战、情报战、迂回战等战法。商初，伊尹是我国古代著名政治家，也是我国军事史上有准确记载的第一位军事谋略家。他主张将人心向背的政治因素用于指导战争，并在作战中实施和发明了诸如孤立敌人、壮大自己、迂回包抄等战术思想。

初始阶段：西周时期，人们对军事已有较全面深入的认识，出现了实质意义上的军事著作。产生于西周初期的《易经》，其内容极为丰富，涉及面很广，其中就包含军事思想。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反对恃强凌弱，但并不绝对反对战争，主张师出有名。产生于西周后期的《军志》、《军政》，是我国最早的专门化军事著作。两书在战争观、治军理论、作战指导上，主要坚持“军礼”思想，主张加强“德治”，即所谓“有德不可敌”。提出作战要量力而行，把握战机，以及军队阵形的严整与纪律的严格。

确立与兼容阶段：春秋战国时期，争霸与兼并战争频繁。一方面，现实的战争需要先进的军事理论作指导；另一方面，战争的实践为兵家升华理论提供了条件。因此，这一时期先后诞生了《孙子兵法》、《吴子》、《孙臆兵法》、《尉缭子》以及诸子论兵的著作。《孙子兵法》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自成体系的军事著作。另外，以《六韬》和《孟子》、《荀子》、《管子》等诸子百家为代表，进一步从社会政治的高度审视一系列军事问题，使军事思想体系更趋完备，更有综合性。

1. 兵家主要思想——安国全军的战争观

兵家是先秦军事思想的主要代表，战争观是整个学说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战争起源、性质、目的，战争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对待战争的态度等。

《吴子》将战争起因归结为五种：一是争夺名位，二是掠夺利益，三是仇恨的积累，四是内乱，五是饥荒。由此看来，战争的爆发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战争是普遍的社会现象，是不可避免的。

在承认战争的历史合理性的基础上，先秦兵家对战争的性质进行了初步的区分。如《吴子》将战争分为五类：义兵、强兵、刚兵、暴兵、逆兵；《司马法》指出，正义战争的目的是“讨不义，诛有罪”。因此，先秦兵家积极支持“诛暴乱，禁不义”的战争，反对杀人越货以满足个人私欲的不义战争。强调从事战争是为了实现兼并与统一，“战胜而强立”。

主张对战争采取慎重的态度，坚决反对穷兵黩武的做法。《孙子兵法》开篇之语就指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提倡“备战”，做好必要的战争准备，确保自己在战争中处于不败的地位，以实现一定的政治目标。《吴子》提出“安国之道，先戒为宝”的观点，强调时刻做好准备，投入对敌作战。由此可见，“慎战”与“备战”并重，是先秦兵家对待战争的根本态度，“安国全军”是他们从事战争的基本出发点。

同时，先秦兵家已初步触及军事从属于政治，战争是政治的集中表现这个实质问题。《孙子兵法》中的“道”已被看做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首要因素。《司马法》提倡“以礼为固，以仁为胜”；《吴子》主张“内修文德，外治武备”，强调用“道”“义”“礼”“仁”规范战争行动。以上所述均是以政治规范指导军事，以“道胜”确保“兵胜”思想的突出体现。

从历史角度看，先秦兵家的战争观，符合春秋战国时期新兴势力的基本要求，是与社会大变革的趋势相一致的，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突出的进步性。

2.“兵凶战危”——儒、墨、道的立场

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都持“非战”的态度。孔子强调以礼乐治国，以仁德服人，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珍惜民力，节制剥削”。站在这种人本主义的立场上，孔子

否定和非议当时的战争。孟子则处处拿自己的“仁政”原则对当时的战争进行衡量。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对战争也持基本否定态度，认为战争是不吉利的事情，“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它使“有为”与“无为”相对立，违背自然本性。提倡对战争采取远而避之的立场，“故有道者不处”。墨家学派的战争观是“非攻”理论。《墨子》一书对当时的战争多有抨击，认为从历史实践考察，战争是凶事，是灾祸，只有极少数国家幸存下来。儒、道、墨的“非战”思想，从道德层面上看，具有批判社会现实，揭露战争弊端的合理一面。然而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来看，儒、道、墨诸家以“仁政”、“兼爱”、“无为”等原则否定当时的战争，实际上也就使得自己的学说成为苍白无力的说教。

儒、墨、道学派虽主张“非攻”、“去战”，但不得不面对当时无法回避的战争现实，不得不重视对军事问题的思考，提出了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战争目的论。儒家主张“义战”，把战争区分为“义战”和“不义之战”两类。所谓“义战”，按儒家理解就是，拯民于水火之中，吊民伐罪，为实施仁政开辟道路。如孟子鼓励齐宣王伐燕，就是明显的实例。墨家主张“非攻”，是特指反对当时那种掠夺性非正义战争。《墨子》把战争区分为“诛”与“攻”两类。“攻”是非正义的，而历史上的“诛”则是正义战争。如大禹征讨有苗、武王伐纣这类战争，就属于“诛”而非“攻”，是正义之举，值得肯定和支持。儒、墨诸家提倡“义战”的思想，反映了其重视对战争性质的区分，是其人本精神的具体体现，对于中国战略文化慎战和平传统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

儒、道、墨三家均高度重视政治与军事的关系，深刻认识到民心向背与战争胜负的关系。儒家在这方面尤为突出，它始终把政治清明、民心所向视为决定战争取胜的首要条件。“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士民不亲附，则汤武不能以必胜也”。道家认为，统治者如能做到谦恭自律，以宽容慈爱的态度对待民众，就能获得他们的信任与支持，无论攻守，都将无往而不胜。墨家主张修明政治，争取民心，以达

到“救守”的目的。上述三家均强调民心向背对于赢得战争的重要意义，揭示了战争活动的本质属性，对后世兵家战争观产生了重大影响。

3. 法家主张——厉行耕战、富国强兵的战争观

法家学说的基本特色是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主张强化君主专制，厉行赏罚，奖励耕战，以农致富，以战求强，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等。法家在战争观上的态度是执著功利，讲究实用。在对待战争问题上，以贯彻高度集权的国家意志为根本宗旨，以是否有助于国家为评价标准。在法家看来，战争既是实现统一、巩固集权的基本途径，那么肯定战争、积极主战、拥护兼并，就成了法家战争观的必有之义和主导特征。法家战争观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主张耕战，追求富国强兵。在激烈的兼并战争环境中，国家经济实力雄厚，军事力量强大，就能够在兼并战争中占主动地位，不断壮大发展。秦国最终灭六国，统一天下，就是很好的实例。法家在阐述战争与政治的内在联系上，与儒、墨、道的仁义兼爱有所不同。它主要指厉行农战，是统一民众意志，以确保统治者能任意驱使民众为其效力。法家的战争观原则，充分反映了新兴势力的代表在军事领域中的积极进取精神。但法家否定教化、独任刑法、刻薄寡恩等做法，也导致了其战争观存在很大局限，即过于热衷战争，将战争抬高到不适宜的地位，以为战争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这显然是片面的，也是有害的。

4. 文武兼施的治军理论

先秦军事思想家把治军的优劣与战争的胜负紧密联系在一起，认为治军是制胜负的前提，制胜则是治军的结果。就治军与战争胜负关系，阐述最为深刻的首推吴起。《吴子》一书最早使用了“治军”一词，并明确提出了“以治为胜”的治军原则。《吴子》认为，军队能否在战场上取得胜利，在于是否做到治理严格，“若法令不明，赏罚不信，禁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何异于用”。具体体现为，军队驻扎时有严格纪律，展开行动时威武雄壮，前进和撤退时秩序井然，将领同士卒同甘共苦，做到上下一心，团

结一致，这样的军队就无往不胜。先秦兵家都主张文武并用，恩威兼施；提倡德刑并用，经武治军。《孙子兵法》主张，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既做到视卒如爱子，又要避免出现“爱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乱而不能治”的现象。

教诫为先，严格训练为治军中心。军队只有经过严格的训练才会具有战斗力，上阵才能杀敌制胜；否则，再庞大的军队也是乌合之众，毫无战斗力可言，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军事训练的重要性在于民众经过一段时间的教育和训练，才能从军作战，保家卫国，乃是不言而喻的道理。《孙子兵法》把训练士卒提高到战略高度来认识，指出军队不进行严格训练，必然会导致“弛、陷、乱”诸局面而遭到失败。对此绝不能等闲视之，“将之至任，不可不察也”。军队训练的目的在于齐心协力，训练胆气与体能，使将士具有良好的身体和心理素质，以适应战争的需要。训练内容是谙识礼义，以固其心；熟悉战阵，以精武艺；注重明耻教战。先秦兵家强调武艺，熟知战阵，提高实战能力。军事训练方法提倡教得其道。主张从实际需要和可能出发，不拘常法，灵活施教。实施分层施教，骨干演化，循序渐进，共同提高军事技能水平。战国时期，魏国精锐“武卒”就是吴起亲自训练出的魏军精华。

赏罚严明，申饬军纪，是治军的关键。先秦兵家认为，做到号令严明，军纪森然，乃是经武治军的关键环节。在此方面的理性认识，首先是讲究政治纪律，要求军队做到爱民抚众，以取得民众的理解与支持。其次是强调军事纪律，要求将士做到令行禁止，以保证军队战斗力。再次是纪律成于教育，从严治军从平时管理抓起，养成严守军纪的习惯。如此，军队才能成为节制之师，无往而不胜。具体实施就是，首先，“治之以法”，制定严明的法规制度，以规范军队的行动。如《孙子·计篇》中所述，“凡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所谓“法令者，民之命也，法之本也”。其次，“信赏明罚”，通过严刑厚赏，迫使将士畏法守纪，听从命令，勇敢杀敌，“故先王明赏以劝之，严刑以威之。赏刑明则民尽死，民死尽则兵强主尊”（《韩非子》）。

举贤上功，将为国辅的治军要义。《孙子兵法》强调，“夫将者，国之辅也”，“故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将帅各方面素质的优劣高下，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军队建设的成败和国家命运的安危。先秦兵家主张将帅要具备优良的素质。总的原则是文武兼备，刚柔相济：“夫总文武者，军之将也；兼刚柔者，兵之事也”（《吴子》）。其具体标准，在《孙子兵法》中要达到“智，信，仁，勇，严”的五项标准。在个人性格修养上，将帅要具备高度的自控能力。用《孙子兵法》的描述为“静以幽，正以治”。即沉着镇定，喜怒不形于色，待人接物公正无私，处理事务井井有条。在选将任将问题上要做到唯才是举，量才录用。妥善处理君将关系，做到用将不疑。先秦兵家和诸子普遍主张保持将权的适当集中和专一，反对国君脱离实际情况干涉部队指挥事宜。以为制胜的重要条件之一是“将能而君不御”。

5. 因敌制胜的作战指导思想

先秦时期是中国古代作战指导思想全面发展、基本成熟的重要历史阶段，《孙子兵法》是其重要代表。

（1）上兵伐谋思想。

全胜战略思想是先秦兵家所追求的用兵最高理想境界。它的核心是以谋略制胜，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形成“不战而屈人之兵”战略思想的代表是兵圣孙武。春秋时期战争的特点，是以军事威慑和政治谋略迫使对方接受自己的条件，真正以主力会战决定胜负的战争为数有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不以兵车”就是明显例证，为形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提供了历史文化的基础。《孙子·谋攻篇》中的“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上述见解鲜明深刻地揭示了用兵手段的极致——上兵伐谋，描绘了用兵理想的最高境界——不战而屈人之兵。《孙子兵法》十三篇中，提到“全”字的

地方有十几处，可见“全”在孙子兵学体系中的地位。它如同《论语》的核心“仁”，《道德经》的核心“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致人而不致于人”的作战指导原则。

孙子和战国兵家关于作战指导原则的论述，是其整个军事思想体系中最为精华的部分。他们根据指导作战实践的要求，提出了许多精辟、卓越的见解，突出反映了其作战指导思想的杰出智慧，而“奇正”、“虚实”、“主客”、“攻守”、“形式”、“轻重”、“久速”、“迂直”等重要论述，成为后世兵家的思想来源和理论指导。

把握主动，致敌就范。作战指导原则的灵魂，就是夺取克敌制胜的主动权。即“致人而不致于人”，掌握了主动权，就等于掌握了制胜之道，就是能将己方拥有的全部军事潜能发挥出来，做到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如何夺取作战主动权，一是发挥将帅的杰出指挥才能，卓有成效地克敌制胜，“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

广施权变，示形动敌，左右战局，夺取胜利。“示形”就是隐真示假，诱使敌人中计上当，最后使其失败。故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卒待之。”奇正并用，出奇制胜，避实击虚，释坚攻脆。要造成有利的作战态势，掌握战场主动权，在作战指挥上首先要解决战术上的奇正变化运用问题。“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孙子·势篇》）既重视正确地配置和使用兵力，做到“以正合，以奇胜”，更重视高明地选择和运用战术，奇正相变。其次，是贯彻“避实击虚”的原则，表现为对敌攻击目标、攻击方向的选择上，要避开敌人的强点，攻击敌人虚弱但却是致命的关键部位，从根本上调动和战胜敌人。把握好攻击时机，运用各种手段使敌士气瓦解，再一举破敌，“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孙子·军争篇》）

因形用权，因敌制胜。①兵不厌诈，因形用权。根据作战形势的变化，灵活机动地实施不同的谋略和战术。《孙子兵法》中的诡道十二法就是很好的例证。灵活机动地运用战术，因敌制胜，事半功倍，做到“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强调“智”、“勇”、